

控制与异化：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与精神情感

陈楠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37

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与社会关系。劳动者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面临“精神异化”危机，其劳动过程被高度异化，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精神焦虑与自我认同断裂问题凸显。与此同时，数字消费主义通过虚拟需求与情感操控加剧了人的精神异化，形成“数字拜物教”与“单向度思维”的文化困境。如何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寻求劳资关系的平衡，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劳动；去主体化；算法控制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capitalism, as a new form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and social relations. Workers in the digital capitalism era face a crisis of ‘spiritual alienation,’ with their labour processes highly alienat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life increasingly blurred, and issues of mental anxiety and fragmented self-identity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eanwhile, digital consumerism exacerbates mental alienation through virtual demand and emotional manipulation, creating cultural dilemmas such as ‘digital fetishism’ and ‘one-dimensional thinking.’ How to achieve a balance in labour-capital relations, protect workers’ rights, and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Key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Emotional labor; de-subjectification; algorithmic control

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和社会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劳动控制机制和精

Received: January 26, 2026

Revised: February 6, 2026

Accepted: February 9, 2026

Published: March 7,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神情感异化现象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亟需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新的概念界定。劳动者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精神异化”趋势日益显著，身体层面的规训已深入到精神层面的异化。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赋权性与资本的控制性之间的张力，也为劳动者主体性的重构提供了可能。

2. 数字资本主义的相关概念

2.1. 数字资本主义的定义

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平台为主要组织形式，通过算法实现资源配置和劳动控制。庄梅茜（2025）指出，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一种新形态，它既延续了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又因数字技术的特性而呈现出新的运行机制和矛盾形态^[1]。

首先，从生产力角度看，数字资本主义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生产力要素，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这些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改变了生产组织方式和价值创造模式。

其次，从生产关系角度看，数字资本主义构建了新型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资料，其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大型科技企业手中，平台则成为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庄梅茜（2025）指出，平台资本主义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通过控制数据和算法，实现了对生产和交换过程的全面掌控^[1]。

再次，从价值形态角度看，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数据价值和网络价值的特殊性。数据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和资本，具有可复制、非竞争性和边际成本递减等特点；网络效应则使平台价值随用户规模增长而加速增长。

最后，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数字资本主义构建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如创新创业、共享经济、灵活就业等。李洁（2025）指出，数字消费主义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通过创造虚拟需求和虚拟满足，使人们沉浸在消费幻象中，忽视真实需求和真实满足^[2]。

2.2. 数字资本主义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化转型，学界形成了多种概念表述，如“平台资本主义”“监视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等。这些概念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结合的具体形态，但其分析重心与理论指向存在差异。

“平台资本主义”主要强调平台企业作为新的经济组织形态，通过双边或多边市场结构实现价值创造与垄断积累，关注重点在于平台的商业模式、市场结构与垄断机制。该概念有助于揭示平台企业在数字经济中的中介权力与制度优势，但其侧重仍集中于产业组织层面，对资本主义整体形态及其深层社会关系变迁的解释力相对有限。

“监视资本主义”聚焦资本通过大规模数据采集与行为预测实现对个体的持续监控与操控，突出数字资本对隐私权、人格权及社会自治空间的侵蚀。这一概念敏锐揭示了数字技术与权力结合所带来的统治新形式，但其分析重点更多落在信息控制与行为塑造层面，对劳动过程及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系统阐释相对不足。

“认知资本主义”强调知识、信息与认知能力成为主要生产力，劳动日益呈现为知识化、情感化与符号化形态，揭示了价值创造重心从体力劳动向认知劳动转移的趋势。然而，该概念更侧重生产力结构变迁，对资本如何通过数字技术重塑生产关系与社会控制体系的论述仍显分散。

相比之下，“数字资本主义”作为统摄性概念，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数字技术变革、资本积累逻辑与生产关系重组统一起来加以把握。一方面，它强调数字技术并未改变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根本逻辑；另一方面，也突出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全过程，使资本主义在运行机制、控制方式与意识形态层面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征。

因此，本文选用“数字资本主义”作为核心概念，旨在从整体性视角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型，将平台运作、数据监控、认知劳动等现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之中。这一概念不仅能够为后文关于劳动控制机制演变分析提供制度层面的解释基础，也有助于将精神情感异化理解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结果，从而增强全文理论逻辑的整体性与解释力。

2.3. 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

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演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受技术变革的推动，也受资本逻辑的引导，反映了技术与资本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纵观历史，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80年代）：数字技术的萌芽与初步应用。这一时期，计算机技术开始从军事和科研领域向商业领域扩展，大型企业开始应用

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和管理自动化。马慎萧与张袁雪湛（2025）指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数字技术主要作为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尚未形成独立的产业和商业模式”^[3]。资本对数字技术的投入主要出于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管理成本的考虑，数字技术与资本的结合还处于初级阶段。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个人计算机普及与互联网兴起。这一时期，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商业化应用，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互联网的开放架构和网络效应，使得信息传播和交流突破了地理限制，创造了新的商业可能性。庄梅茜（2025）指出，互联网的兴起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的革命，它为资本开辟了全新的积累空间^[1]。这一阶段，数字技术开始从生产工具转变为独立的产业和商业领域，互联网公司和电子商务开始兴起。

第三阶段（21世纪初-2010年前后）：Web2.0与社交媒体时代。这一时期，以用户生成内容和社交网络为特征的Web2.0技术兴起，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发展，用户数据开始成为重要的商业资源。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免费服务吸引用户，收集用户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用于精准广告投放，实现了数据价值的商业化。这一阶段，平台商业模式开始成熟，数据作为核心资源的地位日益凸显，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开始显现。

第四阶段（2010年后至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这一时期，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互联网进入移动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数据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模式蓬勃发展。庄梅茜（2025）指出，这一阶段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成熟期，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成为主导的经济组织形式，算法成为关键的控制和治理手段^[1]。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生产和消费方式，也深刻重塑了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数字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始凸显。

总体而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技术变革与资本逻辑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数字技术为资本提供了新的积累空间和控制手段；另一方面，资本的逻辑也塑造了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应用方式。理解了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分析其下的劳动控制和精神异化问题提供历史视角。

2.4. 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从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和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出，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核心特征，这些特征既反映了数字技术的特性，也体现了资本逻辑在数字环境中的运行方式。

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据不仅是信息载体，更是价值创造的基础和竞争优势的来源。庄梅茜（2025）认为，数据已经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谁控制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数字经济的命脉^[1]。

平台成为主导的经济组织形式。平台企业通过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连接供需两端，实现多边市场的协调和价值创造。平台不仅是市场中介，更是市场创造者和规则制定者，通过控制接入条件、交易规则和数据流动，实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治理和价值攫取。平台的核心优势在于网络效应，即平台价值随用户规模增长而加速增长，这导致了赢者通吃的市场格局和平台垄断的趋势。

算法成为关键的控制和治理手段。算法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权力机制，通过数据分析和自动决策，实现对资源配置、劳动过程和用户行为的精确控制。马慎萧与张袁雪湛（2025）指出，算法作为数字平台的核心，连接用户与服务提供商，管理和控制劳动过程，从而促成劳动组织形式的变革^[3]。算法控制在于其高度的自动化和实时性，以及黑箱化的决策过程，使用户和劳动者难以理解和质疑。

上述核心特征共同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面貌，既体现了数字技术的独特性，也反映了资本在数字化环境中运作的新方式。

3.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控制机制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重塑了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也深刻变革了劳动控制机制。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相比，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控制呈现出新的特征，它更加依赖技术手段，渗透性更强，形式也更为隐蔽和多样化。

3.1. 控制手段的演变：从工厂纪律到数字监控

劳动控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其手段和形式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从传统工厂的严格纪律到数字时代的全面监控，控制手段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劳动控制主要依赖于工厂纪律和直接监督。福柯（1999）在《规训与惩罚》中详细描述了工厂、学校、军队等机构如何通过空间划分、时间表、行为规范等手段，对个体进行规训，塑造出顺从的劳动主体^[4]。泰勒制则通过科学管理，将劳动过程分解为标准化动作，并通过计件工资等方式，实现对劳动效率的精确控制。马尔库塞（1989）在《单向度

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技术理性，将控制内化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使得反抗变得困难^[5]。

与传统控制手段相比，数字监控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对劳动过程和劳动者的全方位、实时性监控。GPS 定位、摄像头监控、软件使用记录、生物识别、数据分析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作场景，劳动者的行为、绩效甚至生理状态被转化为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估。李钢（2024）指出，数字技术使得监控无处不在，从工作场所延伸到私人生活，从行为监控深入到生理和心理层面^[6]。

3.2. 平台经济中的劳动控制模式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劳动控制模式。平台企业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市场地位，通过算法调度、用户评分和平台规则等手段，实现了对平台劳动者的有效控制。

算法调度与绩效监控是平台经济运行的核心。算法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管理工具和权力机制，它取代了传统的管理层级，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自动化控制。算法调度的特点在于实时性、动态性和个性化，但其不透明性和不可预测性增加了劳动者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用户评分系统是平台经济中另一种重要的控制机制。李洁（2025）在分析数字消费主义时提到，用户评分机制将市场压力直接转嫁给劳动者，迫使其进行“情感劳动”以取悦消费者^[2]。

平台规则作为新型管理权力，通过服务协议、奖惩制度、行为规范等，对劳动者的行为具有强制约束力。尹帮文（2025）指出，平台规则构成了数字时代的新型工厂法，它以技术化的形式出现，掩盖了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管理意图^[7]。平台规则与算法调度、用户评分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平台经济独特的劳动控制体系。

3.3. 劳动控制的文化维度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控制不仅依赖于技术和制度手段，也借助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实现对劳动者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的塑造与引导。这种文化维度的控制更为隐蔽，但也更为深刻。

创业文化与“自我剥削”话语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文化工具。平台企业将平台劳动者描绘成独立的“创业者”、强调其工作的自主性、灵活性和高回报潜力。尹帮文（2025）指出，创业文化的话语掩盖了平台劳动者实际

面临的控制和剥削，诱导其进行自我驱动和自我管理^[7]。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劳动者容易将平台的控制内化为自我管理的动力，将长时间工作、激烈竞争和承担风险视为实现“创业梦想”的必经之路。

平台企业内部的价值观塑造也是劳动控制的重要手段。大型科技平台企业通常会投入大量资源塑造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如强调创新、效率、用户至上、拥抱变化等。薛睿（2025）指出，平台企业通过价值观塑造，试图构建一种共同体幻象，掩盖内部的权力不平等和利益冲突^[8]。这种价值观塑造的目的是将企业的利益包装成所有成员的共同追求，将服从管理和努力工作提升为一种道德要求。

劳动伦理的重新定义也是数字资本主义文化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劳动伦理强调勤奋、敬业、忠诚等品质，而在数字时代，新的劳动伦理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如适应性与灵活性、数据驱动与量化思维、用户中心与服务意识、在线声誉与自我营销等。这些新的劳动伦理要求劳动者不仅要掌握新的技能，更要调整心态，重塑自我认知，以符合数字资本主义对“理想劳动者”的期望。

4. 数字资本主义下精神情感的异化现象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为理解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精神情感异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虽然针对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初期的劳动关系，但其核心洞见对于分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精神情感异化仍具有重要启示。鲁彦楷与张立伟（2025）指出，数字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与工业劳动有所不同，但其异化本质并未改变，反而因数字技术的渗透性而更加深入和广泛^[9]。

4.1. 精神异化、情感异化与精神情感异化的层次区分

在既有研究与本文分析语境中，“精神异化”“情感异化”“精神情感异化”三个概念既存在内涵差异，又具有内在关联，有必要作出层次化区分。

首先，“精神异化”是总体性、根本性的范畴，指人在社会关系中与自身本质力量、价值意义和主体性之间的疏离状态。其核心表现为个体在意义建构、价值认同与自我理解层面的异化，即人的精神活动被外在力量所支配，逐渐丧失自主性与批判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异化主要体现为个体对算法逻辑、绩效逻辑和平台评价体系的内化，将外在标准视为自我价值尺度，从而导致自我价值感的工具化与单向化。

其次，“情感异化”是精神异化在情感维度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强调人的情感从主体性体验转化为可计量、可管理和可交换的对象。情感不再主要作为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的表达，而是被纳入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机制之中，成为一种被规范化、标准化和商品化的劳动资源。因此，情感异化重点指向情感被工具化、情绪表达被规训以及情感劳动被资本占有的过程。

再次，“精神情感异化”是对上述两种异化形态的综合性概括，用以揭示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精神结构与情感结构同时遭受侵蚀的整体性状态。该概念并非简单并列“精神异化”和“情感异化”，而是强调二者在现实中相互交织、相互强化：一方面，情感的商品化与绩效化加深了人的精神空洞化；另一方面，意义感和主体性的丧失又进一步削弱了个体对真实情感的感知能力。

基于上述区分，本文在理论层面以“精神情感异化”作为统摄性概念，用以指称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的整体性异化状态；在具体分析中，则根据论述重点，分别使用“精神异化”或“情感异化”指向其不同侧面。此种概念层次安排，既有助于保持分析的整体性，也能够增强不同层面论述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4.2. 劳动控制向情感领域的渗透

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劳动控制不再局限于身体和行为层面，而是深入到情感领域，将情感本身纳入资本积累和劳动控制的范畴。这种向情感领域的渗透，使得异化现象更加深入和全面。

情感作为新的资本剥削对象，从体力劳动到情绪劳动的转变，体现在劳动内容的情感化、情感表达的规范化、情感数据的商品化以及情感资本的积累等方面。胡博成与李轶（2024）指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表现为情感被量化、标准化和商品化，成为资本增值的新领域^[10]。赖立与谭培文（2023）指出，数字消费主义通过“算法狡计”设置促销活动，利用消费者的求廉、喜新、从众心理，使其陷入集体式冲动消费，这种“致瘾化”消费模式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的情感自主性^[11]。

在全社会的“大压抑”环境下，“情绪绩效”成为新型劳动指标，情绪稳定、服务态度被纳入 KPI 考核体系，使得情感劳动更加正式化和系统化，加深了资本对情感领域的控制和异化。平台规则对情绪表达的规训，比如外卖骑手需保持微笑、客服人员情绪管理培训等，使得劳动者的情感不再是自发和真实的，而是被工具化和异化的。用户评分机制对劳动者情感的操控，

负面评价直接威胁收入与尊严，使得劳动者不得不压抑真实情感，迎合用户期望。

4.3. 数字劳动中的精神异化表现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导致情感的异化，还引发了更广泛的精神异化现象。这些异化表现深刻影响着劳动者的心理状态、自我认同和生活质量，构成了数字时代的精神危机。陈红与邱灵（2025）认为，数字资本凭借平台垄断，将公共数字资源私有化，通过算法分析“暗箱”操控人的情感以从中牟利，这种“数据被储存起来，由少数个人掌控”的垄断行为加剧了精神生产的异化^[12]。

工作与生活界限越来越模糊化，类似“钉钉文化”的教条规训劳动者，使得劳动者难以完全脱离工作状态，享受真正的休息和放松。魏郡（2025）指出，“数字技术使得工作无处不在，休闲时间被碎片化和工具化，导致真正的休闲和恢复变得困难”^[13]。

自我价值感的丧失与焦虑情绪的普遍化，也与数字劳动的特性和评价机制密切相关。算法评价和数据监控使得劳动者的价值被简化为一系列量化指标，平台经济的不稳定性和竞争压力，使得劳动者处于持续的焦虑与不安全状态中。

社交媒体中的虚假满足与虚拟身份依赖，同样使得劳动者的自我认同变得复杂和分裂。李洁（2025）指出，“社交媒体创造了一种虚拟满足的机制，使人们沉浸在即时反馈和虚拟连接中，忽视了真实需求和深度满足”^[2]。

4.4. 主体性危机与自我认同的断裂

经过上文的探讨，主体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不仅在劳动过程中收到剥削与规训，更深入到了情感层面。成军青与严勇（2025）提出，数字资本通过“数字监视技术”和“情感赋魅商品”制造消费幻象，使消费者在“不知而行”或“虽知却行”的状态下自愿服务于资本逻辑，这种“数字拜物教”深刻削弱了主体的自主性和批判能力^[14]。

可以看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个人的主体性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算法和平台的决策权力日益增强，减少了人的自主选择 and 判断空间；另一方面，数据监控和行为引导使得个体行为越来越受外部因素影响，自主性受到限制。同时，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使得自我认同变得复杂和分裂，难以形成稳定和一致的自我概念。胡博成与李轶（2024）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主

体性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情感被技术和资本双重异化的结果，表现为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多重断裂^[10]。

马尔库塞（1989）在《单向度的人》中描述的“单向度思维”，在数字时代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数字环境中的信息茧房、算法推荐和舆论引导，使得批判性思维和多元视角受到限制，个体容易陷入单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

总之，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精神情感异化，从情感劳动的商品化，到工作生活界限的模糊，再到主体性危机和自我认同断裂，构成了一个从表层到深层的异化链条。其最终导致了更深层次的主体性危机和自我认同断裂。这种危机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关乎人的本质和尊严。

5. 劳动者主体性的抵抗与重构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控制和精神异化，劳动者并非完全被动和无力的。在控制的缝隙中，劳动者展现出了多种形式的抵抗策略和主体性重构尝试，这些抵抗和重构不仅关乎个体的生存和尊严，也蕴含着改变现有劳动关系的可能性。

5.1. 数字劳动者意识的觉醒

新兴劳工群体的认知变化主要表现在从“自由创业者”到“平台劳工”的身份转变、从个体归因到结构认识的思维转变以及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维权的行动转变。马慎萧与张袁雪湛（2025）认为，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开始意识到自己并非真正的合作伙伴，而是受到平台严格控制和剥削的劳工^[3]。

数字劳动者意识的觉醒是抵抗和重构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当劳动者认识到自身处境和利益，才能采取有效的抵抗行动和重构策略。

数字技术不仅是劳动控制的工具，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交流、组织和行动平台。网络社群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空间，为数字劳动者的集体认同形成和集体行动开展提供了重要基础。马慎萧与张袁雪湛（2025）指出，数字平台既是劳动控制的场所，也是劳动者抵抗和组织的空间，这种双重性为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3]。

通过网络社群的互动和交流，劳动者能够发现共同经历和利益，形成“我们”的集体认同和团结意识。这种集体认同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心理和情感基础，使分散的个体能够凝聚成为有组织的群体，也有助于其形成集体认同和

团结意识。一旦劳动者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就会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强大的阶级力量以对抗压迫他们的阶级，从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5.2. 数字劳动者的反抗策略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异化，劳动者发展出了多种反抗策略和替代性实践。这些策略和实践不仅是对现有控制的抵抗，也是对新型劳动关系和组织形式的探索。

算法控制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控制手段，但劳动者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而是通过各种“戏仿”和“绕过”行为来应对和抵抗算法控制。

外卖骑手可能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频繁上下线，以触发平台的补贴机制；网约车司机可能会在特定区域拒单，以引发价格上涨；一些网约车司机还会使用第三方软件来修改位置信息，避免不利的派单。这些行为表面上遵循平台规则，实际上是对规则的策略性利用和挑战，也反映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马慎萧与张袁雪湛（2025）指出，工人能够找到绕过平台声誉度量的方法，通过与客户形成在线联盟来操纵绩效评估系统^[3]。这些行为反映了劳动者对算法系统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是一种日常形式的抵抗。

5.3. 主体性的重建方向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异化，劳动者主体性的重建不仅关乎个体的生存和尊严，也关乎社会的公平和进步。

数字劳动的人文关怀与伦理建设是主体性重建的重要基础。它强调在技术发展和经济效率之外，关注人的尊严、价值和全面发展，构建更加人性化和伦理化的数字劳动环境。胡博成与李轶（2024）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情感异化需要通过重建生命情感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来克服，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技术与人的关系，强化人文关怀和伦理建设^[10]。

教育与媒介素养在主体性重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帮助个体理解数字环境的特性和影响，培养批判思考和自主判断能力，增强在数字世界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李洁（2025）指出，数字消费主义视域下的精神异化需要通过提升个体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意识来应对，这要求我们重视教育的启蒙和赋能作用^[2]。

技术民主化与劳动者赋权是主体性重建的核心方向。它们强调扩大劳动者对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参与和控制，增强其在数字环境中的权力和自主性，从而改变技术与劳动的关系。马慎萧与张袁雪湛（2025）引述的研究指出，

技术民主化是应对数字资本主义控制的重要途径，它要求将技术决策权从少数精英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技术的直接使用者和受影响者^[3]。

6. 结论

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控制呈现出从外在强制向内在规定、从直接监督向算法治理、从集中控制向分散控制的转变趋势，构建了一套更为精细、隐蔽且渗透性强的控制体系。这种新型劳动控制不仅作用于劳动者的身体，更深入到其思想意识和情感领域。然而，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异化，劳动者并非完全被动和无力的。在控制的缝隙中，劳动者有多种形式的抵抗策略和主体性重构尝试。这些抵抗和重构不仅关乎个体的生存和尊严，也蕴含着改变现有劳资关系和改善劳动者生活质量的可能性。

总之，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深入理解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控制与精神情感异化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通过多方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挑战中，开辟出一条更加公平、可持续和人性化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庄梅茜.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国外理论动态,2025,(01):89-98.
- [2] 李洁.数字消费主义视域下人的精神异化的现实症候及应对策略[J].教学与研究,2025,(03):91-100.
- [3] 马慎萧,张袁雪湛.国外左翼学者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进展[J].国外理论动态,2025,(01):58-68.
- [4] 福柯.规训与惩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6] 李钢.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控制及其解放路径蠡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09):134-144+152.
- [7] 尹帮文.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剥削及其应对[J].理论导刊,2025,(04):43-50.
- [8] 薛睿.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精神生产及其理论审思——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11(03):38-48.
- [9] 鲁彦楷,张立伟.数字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及其主体性异化[J].经济纵横,2025,(04):46-55.
- [10] 胡博成,李轶.论数字资本主义生命情感的焦土化症候、本质澄明及应对理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03):121-127.
- [11] 赖立,谭培文.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数字消费内蕴矛盾及其消解路径[J].当代经济研究,2023,(11):28-36.

- [12] 陈红,邱灵.数字资本主义下我国精神生产安全的风险及应对[J/OL].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2025-06-06].
- [13] 魏郡.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休闲困境”:资本逻辑与主体疏离的双重张力[J/OL].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3[2025-06-06].
- [14] 成军青,严勇.数字资本主义中精神异化的消费主体及其批判[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01):11-18.